

在衝突與秩序之間—— 亞當·佛格森與羅馬史的道德意涵

陳建元*

本研究重新評估亞當·佛格森於1783年出版的《羅馬共和興衰史》，並將其置於十八世紀羅馬史書寫的脈絡中，特別關注其與愛德華·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對話。本文指出，佛格森的歷史敘述呈現出思想上的張力：他在新馬基維利主義所強調的公民衝突與德性，以及文雅文化追求秩序與和諧的理想之間，發展出一種兼具政治分析與道德省思的敘事方式。佛格森透過對史料、人物與制度的比較與詮釋，不僅揭示羅馬共和衰亡的內在邏輯，也藉此回應同時代的政治辯論，特別是美國獨立戰爭所引發的共和理念與帝國治理之爭。本文進而重新定位佛格森在十八世紀史學傳統中的地位，並揭示其作品如何開拓出兼具道德反思與歷史詮釋的新方向。

關鍵詞：羅馬共和、愛德華·吉朋、十八世紀史學、亞當·佛格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亞當·佛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在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中以社會與政治思想家著稱，然而相較於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與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 1721–1793)等同時代史家，他在史學與思想史領域中的地位仍顯得相對邊緣。雖然學界已有不少研究關注其歷史書寫實踐，特別是對《羅馬共和興衰史》(*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783；以下簡稱《興衰史》)的敘事風格與古典來源進行探討，但這些研究多集中於史料處理與文體分析，對該書所體現的政治思想內涵，尤其是其對共和制度衰亡的深層剖析，討論仍顯不足。

本文主張，佛格森在《興衰史》中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歷史敘述方式，將社會結構、道德情操與軍事改革等因素交織於對政治衰敗的敘述之中，不僅與同時代史家在書寫策略上形成鮮明對比，也展現出他以歷史書寫介入當代政治辯論的積極意圖。本研究重新檢視《興衰史》，試圖補充這方面的認識，並探討佛格森如何在論述共和衰亡時，將社會、道德與軍事等要素融入歷史書寫，形成了有別於同時代史家的敘述特色。這項研究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佛格森在十八世紀史學中的地位，也能加深我們對那個時代歷史書寫的政治內涵與思想複雜性的理解。

《興衰史》的誕生並非偶然之舉，而是歷經十餘年構思與史料蒐集的成果。佛格森在 1782 年致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漢(William Strahan, 1715–1785)的信件中明確表示：「大約十二年來，我一直專注於這個主題；事實上，我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這一議題上。」¹可見本書並非附屬於其

¹ Adam Ferguso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Ferguson*, ed. Vincenzo Merolle, vol. 2 (Brookfield, VT: William Pickering, 1995), 284.

哲學著作的延伸構想，而是他自成體系、長期投注的歷史書寫工程。更早在 1776 年，佛格森便致信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提及自己幾乎將所有閒暇時間投入筆記整理與史料研究，意圖撰寫一部關於羅馬共和衰亡與奧古斯都(Augustus, 63 BCE–14)政權興起的歷史。²然而，最終完成的《興衰史》不僅敘述了晚期共和的政治危機，其結構與視野遠超原始構想。佛格森擴展了研究時間範圍與主題焦點，涵蓋羅馬對外擴張、制度演變與內部矛盾的歷史動力，試圖將共和制度的崩解與帝國秩序的建立置於一個整體的歷史過程中理解。這種架構不僅展現他對古典資料的掌握，更反映出他對政治秩序轉型問題的深層關懷。本研究將從如此的史學企圖出發，探討佛格森如何藉由歷史敘述，介入十八世紀對共和、腐化與軍事專制等問題的深層辯論。

佛格森的《興衰史》延續了薩魯斯特(Sallust, 86–34 BCE)式的歷史敘述傳統，強調野心(ambition)、動盪與權力鬥爭對共和制度的影響，而非僅僅關注制度演變的理性分析。這種寫作方式，使他的歷史書寫更貼近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的政治史觀，而不同於羅伯遜那種帶有哲學史反思色彩的風格。在這一點上，佛格森的歷史敘述與《文明社會史論》(*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67)中蘊含的政治思想密切相關，特別是他對共和制度衰亡的探討，與他對公民美德、社會衝突及國家穩定性的關切相互呼應。他所撰寫的羅馬史在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尤其在於他試圖填補當時學界所深切感受到的一項缺憾。這種缺憾不僅反映在對羅馬歷史的研究中，更揭示了英語史學界的某種焦慮：如何以適切的方式，將古典時代的歷史經驗轉化為當代政治思考的資源？相較法語與德語世界對羅馬史的長期關注，英語讀

² Adam Ferguso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Ferguson*, ed. Vincenzo Merolle, vol. 1 (Brookfield, VT: William Pickering, 1995), 141.

者始終缺乏一部能夠綜合政治分析與文學表達的權威著作。雖然古典作家的記述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如何以現代語言重述這段歷史，並將其置於啟蒙時代的政治與道德討論之中，仍是一項尚待填補的空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佛格森的《興衰史》試圖提供一種兼顧敘事、分析與政治啟示的羅馬史書寫方式。

本研究重新評估佛格森作為歷史學家的地位，特別關注《興衰史》在十八世紀歷史敘述與政治思想中的獨特性。思想史家波考克(J. G. A. Pocock, 1924–2023)在其一系列研究中，將「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m)描述為一種將「良善之人」等同於積極參政的公民的政治理想。他指出，在此傳統裡，個人美德(virtù)必須奠基於公民共同體：只有在追求公共事業(res publica)的公民社會裡，個人才有可能實踐美德。由此，政治體制(politeia)與美德幾近同義，公民的美德與政治體制的穩定相互依存。一旦政治體制因為突變或階級分化而崩壞，公民的美德將隨之腐化，獨裁者因失去與他者平等互動的公民身分，無法被視為良善之人。³總之，波考克認為公民人文主義將個人美德政治化，並把共和政體視為實踐美德的唯一場域。

此框架被波考克用來分析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波考克指出，蘇格蘭思想家——如佛格森等——承襲了馬基維利式的共和主義觀點，將歷史視為美德與商業進步(或社會分工)之間辯證關係的發展過程。例如，佛格森在其羅馬史中區分古典武德(與共同體結合的原始武勇)與現代美德(文明進步下的綜合德性)，指出隨著商業社會發展，真正的美德和

³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2;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469.

軍事精神被專業化與物質文明侵蝕。波考克甚至稱佛格森為「身為溫和派的馬基維利主義者」(the Moderate as Machiavellian)。⁴換言之，佛格森被視為典型的公民人文主義者：他警告商業化與職業化軍隊將撕裂公民社會，把城邦的成功基礎推向毀滅。波考克為公民人文主義提出了政治化美德的定義，並以此說明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如佛格森等人，如何在歷史理論中處理美德興衰與商業進步的根本矛盾。

自波考克以來，學界對「公民人文主義」和共和傳統的詮釋持續展開辯論。部分學者認為波考克過度將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等同於共和主義，忽視了商業與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另有學者指出「共和語言」本質上是一種話語資源，可被不同政治力量因時制宜地運用，而非固定的意識形態。儘管存在這些理論爭議，波考克的分析框架仍為理解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提供了重要視角。⁵

近年對佛格森的研究在思想定位與史學意義上出現顯著分歧，形成了幾條彼此交錯的詮釋路線。麗莎·希爾(Lisa Hill)2006年出版的《激情社會：亞當·佛格森的現代性理論》(*The Passionate Society: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Mor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以「進步—衰退」的張力為核心，將佛格森的歷史哲學、道德心理與政治經濟整合於宏觀理論框架之中，開啟了從長時段社會理論視角理解佛格森的經典路徑。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於2019年出版的《亞當·佛格森與公民社會的理念》(*Adam Ferguson and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則聚焦於「公民社會」與「道德科學」的建構，

4 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2, *Narratives of Civil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30–365.

5 Cary Nederman, “Civic Humanism,”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N. Zalta and Uri Nodelman, Spring 2024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4/entries/humanism-civic/>, accessed November 23, 2025.

凸顯佛格森在蘇格蘭啟蒙方法論與制度分析上的地位。⁶兩者雖關注層面各異，但皆傾向將《羅馬共和興衰史》視為思想史的承載體，而非獨立分析其史學實踐的對象。

由尤金·希思(Eugene Heath)與文琴佐·梅羅勒(Vincenzo Merolle)主編的《亞當·佛格森：歷史、進步與人性》(*Adam Ferguson: History, Progress and Human Nature*, 2008)，試圖在議題上橫向拓展，匯集多篇探討佛格森史學理論、道德哲學與思想網絡的論文，形成議題多元卻在方法上仍偏重思想史的研究圖景。這種對理念的集中關注，也延續至伊恩·麥丹尼爾(Iain McDaniel)2013年出版的《蘇格蘭啟蒙中的亞當·佛格森：羅馬的過去與歐洲的未來》(*Adam Ferguson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Roman Past and Europe's Future*)。⁷麥丹尼爾雖明確挑戰波考克的「公民人文主義」詮釋，將佛格森重新置入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的思想脈絡，並將《羅馬共和興衰史》解讀為對十八世紀歐洲政治危機的警示——特別是對軍事獨裁與民主動盪交互作用的深層憂慮——但其關注重點仍屬政治思想比較，而非史學實踐分析。

與此相比，麥克斯·修恩斯貝(Max Skjönsberg)近期的論文更貼近從文本內部出發的細讀，直接檢視佛格森對羅馬共和體制中派系鬥爭與群眾參政風險的批評，並挑戰將衝突視為共和活力來源的經典論述。修恩斯貝注意到佛格森在《羅馬共和興衰史》中，自述其寫作旨在提

⁶ Lisa Hill, *The Passionate Society: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Mor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Craig Smith, *Adam Ferguson and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Moral Science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9)。

⁷ Eugene Heath and Vincenzo Merolle, eds., *Adam Ferguson: History, Progress and Human Natur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 Iain McDaniel, *Adam Ferguson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Roman Past and Europe's Fu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供一種連貫的歷史敘事，但並未進一步分析這種史學自我定位與實際敘事策略之間的張力。⁸這也凸顯出一個跨研究的共通現象：無論是宏觀理論的架構、制度與觀念的重估，或文本細讀的再詮釋，現有成果多將《興衰史》視為思想史的載體，而對其在十八世紀羅馬史書寫傳統中的具體運作模式關注不足。

本文正是在這些對話與斷裂之間尋找切入點。希爾所揭示的「進步—衰退」悖論、史密斯強調的制度與公民社會分析、麥丹尼爾的保守警覺定位，以及修恩斯貝的文本批判，各自凸顯佛格森思想的一面，卻共同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佛格森如何透過史料選擇、多源比較、場景化鋪陳與人物—德性—制度的互證，構築出一種在衝突與秩序之間調停的敘事策略。這種調停不僅是政治立場的折衷，更是史學方法上的創新，使《興衰史》同時回應十八世紀羅馬史傳統與當代政治語境。

「新馬基維利主義」(neo-Machiavellianism)承襲馬基維利《論李維》(*Discourses on the First Decade of Titus Livius*, 1531)及詹姆士·哈靈頓(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的共和傳統，強調公民德性、對權力集中的警惕，以及透過積極的政治參與防範權力腐化。「新馬基維利主義」在十八世紀英國與商業社會理論結合，既關注國家競爭力與安全，也警覺商業擴張可能帶來的腐化與不穩定。在史學實踐上，這種立場強調適度政治衝突的建構性作用，主張派系競爭是維繫政治活力、制衡集權的必要條件。⁹

相對地，「文雅論述」(polite discourse)則源自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英格蘭與蘇格蘭知識精英的文化理想，涵蓋禮儀、談話藝術與社交品

⁸ Max Skjónsborg, “Adam Ferguson on Partisanship, Party Conflict,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6:1 (2019): 1–28.

⁹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384–479; 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4, 271–316.

味，旨在以理性協商化解宗教與政治對立，並呼應商業社會對穩定的需求。¹⁰在史學書寫中，它展現為敘事的節制與平衡，避免過度的政治激情，追求理性而節制的分析。佛格森並不否定這一理想對秩序與理性對話的重視，但同時主張必須承認並制度化政治衝突的必然性與活力。正是在這兩種政治語言之間，他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敘事策略，將衝突的活力與秩序的維繫交織於歷史敘事之中。

本文主張，《興衰史》不僅是一部政治思想文本，更是一種史學創新，嘗試在塔西佗(Tacitus, c.56–120)、薩盧斯特(Sallust, c.86–35 BCE)、夏爾·羅蘭(Charles Rollin, 1661–1741)與奧利佛·高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c. 1730–1774)等傳統中調和多重歷史語言。佛格森藉由與同時代羅馬史家(特別是吉朋)的對話，發展出一套介於新馬基維利主義與十八世紀文雅論述之間的敘事策略。他一方面延續市民人文主義對自由與德性的關注，承認政治衝突在共和體制形成初期的建構性作用；另一方面又深刻警惕衝突演變為破壞性派系鬥爭的危險，批判性地吸收當時文雅文化對秩序、穩定與和諧社會的期待。透過對格拉古兄弟(the Gracchi, 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 163–133 BCE]; 蓋烏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 154–121 BCE])、馬略(Gaius Marius, c. 157–86 BCE)與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 100–44 BCE)的重新演繹，佛格森不僅呈現共和政治與帝國統治之間的張力，更運用特定的史料比較、人物塑造與敘事節奏，探討政治衝突如何從維繫共和活力的動力，轉變為促成制度崩解的催化劑。這種在衝突與秩序之間尋求動態平衡的敘事策略，既區別於馬基維利式的樂觀衝突論，也有別於純粹文雅論述的和諧理想，為我們重新理解《興衰史》的史學方法與政治關懷提供了超越傳統思想史框架的新視角。

¹⁰ 陳建元，〈伯納德·曼德維爾論十八世紀文雅文化與國家富強〉，《新史學》，34：2(臺北，2023)，頁1–49。

本文的分析主要依據佛格森《興衰史》1834年倫敦合刊本。¹¹該版本整合1783年初版與1799年修訂版，是十九世紀上半葉流通最廣的版本；關鍵段落另對照初版以校勘重要差異。值得注意的是，佛格森在書名中選擇 *Termination* 一詞，而非同時代史家常用的 *Decline* 或 *Fall*。此一用語強調的是「終止」或「完成」，暗示共和國的崩解並非純粹的衰落過程，而是某種歷史發展邏輯的終結。相較於 *Decline* 所隱含的漸進性、或 *Fall* 所指向的斷裂與崩潰，*Termination* 蘊含更強的過程意識與必然性，意味著共和國的結束乃是內在矛盾推至極限後的歷史收束。這種語詞選擇揭示了佛格森的史學立場：他書寫的並非一個文明的失敗，而是在追蹤一個制度由盛轉衰、最終「完成其歷史使命」的結構性進程。

本文的研究方法定位為史學分析，而非單純的思想史詮釋。我們將依序檢視佛格森從《文明社會史論》到《興衰史》，在史料運用、敘事建構與人物刻畫上的轉換；比較《興衰史》與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羅馬帝國衰亡史》在史學方法上的異同；並探討佛格森如何藉由獨特的敘事技巧，將古典史料轉化為當代的政治教育工具。分析焦點在於他作為歷史學家的方法論創新：如何重新定義史學的社會功能，發展出具有教育性的敘事策略，並在十八世紀史學傳統中取得獨特地位。透過這一取向，我們得以更準確地評估佛格森的史學貢獻，而不是僅將其作品視為政治理論的載體。

全文架構如下：第二節將勾勒十八世紀英國羅馬史撰述的主要傳統，特別關注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及相關作品，分析新馬基維利主義與文雅論述如何影響羅馬史書寫，並指出《興衰史》如何發展出

¹¹ Adam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Complete in One Volume* (London: Jones & Company, 1834).

獨特的敘事策略；第三節探討《興衰史》與《文明社會史論》的延續與轉變，分析佛格森如何將抽象社會理論轉化為具體的歷史敘事；第四節則聚焦於《興衰史》的方法與敘事策略，分析他如何在承認政治衝突必要性與警惕其破壞性後果之間尋求平衡；第五節進一步考察佛格森政治立場的轉向，特別關注其在回應美國獨立戰爭時如何發展出更保守的觀點，並體現在對共和衰亡的詮釋之中。本文藉此補足既有研究對《興衰史》史學面向的忽略，重新定位佛格森在十八世紀史學傳統中的地位，最後提出結合歷史敘事實踐與政治語言傳統的詮釋視角。

二、十八世紀英國的羅馬史書寫傳統

與大衛·休謨撰寫共六冊的《英格蘭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1754–1762)之前的情況相似，¹²十八世紀英國仍缺乏一部兼顧政治分析與文學表現的羅馬史著作。羅馬史雖常被視為英國政治發展的參照，但英國的政治傳統主要承襲日耳曼—中世紀制度傳統，並未直接繼承羅馬共和的政治結構。因此，羅馬並非英國制度的歷史源頭，而是一種理想典範。對貴族階層而言，羅馬提供了將統治權與公民德性相結合的歷史典範，使統治正當性不僅來自世襲身份，更奠基於對公共責任的承擔。

十八世紀政治思想深受新馬基維利主義與新哈靈頓主義(neo-Harringtonianism)影響，兩種思潮皆強調共和制度內部的權力平衡與社會衝突。對這些政治理論家而言，羅馬史不僅是古代歷史，更是理解當代政治運作的關鍵案例。早期如勞倫斯·埃查德(Laurence Echard, c.1670–1730)於1696年出版的《羅馬史》(*The Roman History*)，雖試圖以簡明敘事

¹²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foreword by William B. Todd, 6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3).

取代古代史書的繁冗修辭，仍未能滿足讀者對系統性政治分析的需
求。¹³高史密斯在 1769 年出版的《羅馬史》(*The Roman History*)中試圖在歷
史學的權威性與文雅社會的敘事風格之間取得平衡，但實質上仍以古
典史料的彙編為主，未能對羅馬歷史提出更具深度的詮釋。¹⁴

在此背景下，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1788)標誌著十八世紀羅馬史書寫的重要轉向。
吉朋採用了啟蒙史學的理性分析方法，建立清晰的盛衰敘述模式。其
開篇即以讚美筆調描述安敦尼時代(The Age of the Antonines)的黃金歲月：

在基督教紀元的第二世紀，羅馬帝國包含了地球上最美好的部
分，以及人類最文明的部分……在超過八十年的幸福時期中，公
共管理由尼爾瓦(Nerva, 30–98)、圖拉真(Trajan, 53–117)、哈德良(Hadrian,
76–138)和兩位安東尼(即安敦尼努斯·庇烏斯[Antoninus Pius, 86–161]與馬爾
庫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 121–180])的美德與才能來主導。¹⁵

對於這一黃金時代的奠基者奧古斯都，吉朋不僅從制度角度評價其政
治成就，也揭示其戰略轉向的深層理性：「羅馬人的主要征服皆在共
和時期完成；其後諸皇帝大多以維持既得領土為務，而這些疆域乃由
元老院的政策、執政官的野心競逐及人民旺盛的軍事熱情所奠定……
最終則由奧古斯都終止了征服四方的雄圖，並將節制之風引入國家決

¹³ Laurence Echard, *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Building of the City to the
Perfect Settlement of the Empire by Augustus Caesar: Containing the Space of
727 Years* (London, 1696).

¹⁴ Oliver Goldsmith, *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2 vols. (London: S. Baker and
G. Leigh; T. Davies; and L. Davis, 1769).

¹⁵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J.B. Bur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E.H. Lecky, vol. 1 (New York: Fred de
Fau and Co., 1906), 1.

策。」¹⁶吉朋補充道：「由於他的性情和處境皆傾向和平，因而能敏銳意識到，羅馬在當前已臻巔峰的情勢下，訴諸武力所能獲得者已遠不及其可能蒙受之風險；遠征之舉日益艱鉅，結果愈發難測，即便得勝，所得亦不穩固而收效有限。」¹⁷

吉朋指出，奧古斯都在鞏固權力的過程中，並非單憑軍事威望強行奪權，而是巧妙運用憲政制度的形式，將事實上的君主統治包裝於共和外衣之下。吉朋指出，他在即位初期曾公開辭去權力，宣稱將國家還給元老院和人民，但這一舉動實為精心設計的政治戲劇。面對奧古斯都宣稱「他莊嚴地將元老院和人民的所有古老權利歸還給他們；並只希望與同胞們混為一體，分享他為國家獲得的福祉」，¹⁸元老院的反應卻完全在他的預料之中：「他們拒絕接受奧古斯都的辭職；他們懇求他不要拋棄他所拯救的共和國。經過一番得體的抵抗後，這位狡猾的暴君屈服於元老院的命令。」¹⁹

奧古斯都隨即以總督與統帥(Proconsul and Imperator)的身份，接受對各行省的行政權以及羅馬軍隊的最高指揮權。更重要的是，「元老院允許他終身享有執政官與護民官職權」，²⁰使他能夠「將分散於各處的民政權力巧妙地匯聚於自身」。²¹同時，他還獲得了最高宗教職位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的身份，成為軍事、民政與宗教三方面的最高仲裁者。吉朋尖銳地評價這種政治創新：「當執政官和護民官的權力結合在一起，當它們終身歸屬於一個人，當軍隊的將軍同時是元老院的大

16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2.

17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2.

18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77.

19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78.

20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82.

21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82.

臣和羅馬人民的代表時，要抗拒這種帝國特權的行使是不可能的，要界定其限度也並不容易。」²²最終，吉朋將整個帝制體系概括為「一個披著共和外衣的絕對君主國」。²³

在軍事與防禦政策上，吉朋以海軍體系及其軍力為例，說明帝國的防禦性取向：「皇帝所維持的海軍雖看似與其偉業不相稱，但對政府一切有用的目的已足夠……奧古斯都在拉溫納(Ravenna)與米塞努姆(Misenum)各設常備艦隊，分別統御地中海東部與西部，並為每支艦隊配置數千名士兵。」²⁴吉朋指出，若檢視帝國武力的整體配置——包括騎兵與步兵、軍團與輔助部隊、禁衛軍乃至海軍——「最寬鬆的估算也不過四十五萬人」。然而，這支看似龐大的武裝力量，其威勢雖然驚人，實際上僅相當於十七世紀歐洲，一位疆域僅等同於羅馬帝國一個行省的君主所能動員的軍力。²⁵吉朋藉由此一軍力對照揭示奧古斯都由擴張轉向節制的政策轉折，並據此建構出一套以理性治理而非軍事擴張為核心的帝國盛衰解釋模式。

然而，當敘事轉向拜占庭歷史後，吉朋發現線性的「從盛而衰」模式難以維持。他在序言中明確承認：「從七世紀到十一世紀，這段晦暗的間隔將由簡明的敘述來補充，僅包含那些仍然顯得有趣或重要的事實。」²⁶第四次十字軍的例子尤為明顯：遠征軍最終未前往敘利亞，而是轉向攻打君士坦丁堡。吉朋認為，此一偏離既定目標的關鍵在於領導層的薄弱——除匈牙利國王外，其餘皆為地位較低的諸侯領軍，致使兵力不足以支撐原定計畫，最終成果亦與教宗及基督徒大眾

22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82.

23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86.

24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22.

25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23.

26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xxxii.

的期望相去甚遠。²⁷

吉朋的史學方法為佛格森提供了關鍵的對話基礎。兩位史家在時間上幾乎重疊——吉朋的第一卷出版於 1776 年，佛格森的《興衰史》完成於 1783 年——皆面臨如何理解羅馬政治制度轉型的核心問題。與吉朋的制度分析不同，佛格森通過對共和制向帝制轉變過程的細緻描繪，揭示軍事力量與公民德性分離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佛格森指出：「在前述戰爭的所有進程中，每一個環節都促成了共和國的衰落與凱撒的成功……甚至本應保護共和國的軍隊，也掌握在純粹的雇傭兵手中，他們傾向於支持那個能為他們建立軍事政府的一方。」²⁸他進一步指出：「他們作戰是為了為自己謀取巨大的權力和財產，而非為了保護那些給予他人財產與財富安全的法律。」²⁹

佛格森在論及奧古斯都的統治時，揭示了從共和制向帝制轉變的微妙機制：「[奧古斯都]以巧妙的判斷和手段壓制了軍隊的放縱，而正是這些軍隊使他得以上位；他狡猾的政策表面上恢復了他自己所破壞的文官政府的某些片段，以及他在保持文官和公民身份的外表時所表現出的謹慎，同時卻作為主人進行統治。」³⁰

相較於吉朋的理性分析，佛格森更關注政治轉型中的道德維度。在評價奧古斯都的統治時，佛格森採取更為複雜的道德判斷：

若我們將自己視為在奧古斯都臨終時，替他向理性世界所作最後申訴的裁判者，那麼或許可以說：正如他在某種程度上，能以

²⁷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J.B. Bur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E.H. Lecky (New York: Fred de Fau and Co., 1906), vol. 10, 313.

²⁸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305.

²⁹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306.

³⁰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39.

其統治的施政彌補奪取權力時的罪行，我們既不會以他早年似乎應得的指責與惡名稱呼他，也不會以他在後半生較長、較高尚統治所似乎應得的讚辭來頌揚他。³¹

佛格森進一步分析帝制如何腐蝕共和制度的基礎。他指出，在奧古斯都建立的制度下，「這種惡行被那些假意忠誠的間諜與告密者所助長，他們部分為了討好，部分為了從沒收財產中獲得獎勵，努力維持持續的審訊。」³²此外，通過對卡圖(Marcus Porcius Cato, 95–46 BCE)之死的描述，佛格森展現了共和精神的最後掙扎。當兒子詢問為何不向凱撒求情時，卡圖答道：「我生而自由，豈能在暮年屈身為奴。」佛格森評價卡圖為「罕見的品德典範，即使在眾人對其敵人阿諛奉承的時代，仍受人讚頌」。³³

這種史學方法上的差異反映了十八世紀史學的兩種不同取向：吉朋強調制度演進的理性邏輯，佛格森則著重於政治轉型中道德文化的作用。吉朋傾向採用結構性分析，將歷史變遷理解為各種客觀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佛格森則採用了更強調道德維度的敘事策略，將個人品格、道德選擇與政治責任置於歷史分析的中心。

佛格森與吉朋之間有直接的學術往來。早在 1776 年，佛格森便致信吉朋，討論《羅馬帝國衰亡史》，並透露自己正在撰寫羅馬史著作。在此背景下，佛格森的《興衰史》試圖在馬基維利主義對政治衝突的重視與當代對社會穩定的追求之間，尋求一種既能保持共和活力，又不致導向制度崩潰的敘事策略。因此，佛格森撰寫《興衰史》的目標並非僅為提供一部簡明通俗的羅馬史，而是試圖探討共和政體如何被專制統治取代這一根本問題。他明確指出，雖然「基於古代作

³¹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39.

³²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49.

³³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298.

者遺留下來的證據所撰寫的羅馬史，已被翻譯成多種歐洲語言」，但至今仍缺乏一部「真正符合這一主題的歷史，一部簡潔、沒有過度矯飾、既包含有用細節，又能全面而公正地展現羅馬人的軍事行動與政治經驗的著作」。³⁴

馬基維利在《論李維》中主張貴族與平民的對立是自由與國家強盛的根源，但佛格森在《興衰史》中對此更為敏感，他將格拉古兄弟時期的社會衝突視為制度崩潰的催化劑，而非共和活力的象徵。十八世紀對羅馬衝突的詮釋呈現多元立場，康耶斯·米德爾頓(Conyers Middleton, 1683–1750)雖批評格拉古兄弟濫用權力，卻仍肯定貴族與平民衝突促進了制度的修正與完善。佛格森在這些論辯中既不全然肯定衝突的積極作用，也不完全否定其價值，而是將其納入歷史辯證的架構之中：衝突既是共和制度的動力，也是潛伏的危機根源。

佛格森的羅馬史書寫超越了當時英國學者對憲政設計與具體制度問題的關注，試圖從羅馬歷史中提煉出更為根本的提問：現代商業社會如何維繫公民美德？政治制度如何在社會變遷中保持活力？這些關懷反映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特殊視角，也體現了 1707 年《聯合法案》(Act of Union)後蘇格蘭知識份子面臨的獨特挑戰：如何在失去政治主權的情況下，重新思考公民身份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

在深入探討佛格森的《興衰史》之前，需要先回到他早期的代表作《文明社會史論》，釐清其中與羅馬史相關的核心論點。透過比較兩書的異同，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如何將抽象的社會理論轉化為具體的歷史敘事，並在馬基維利主義的現實衝突觀與啟蒙時代文雅論述的和諧理想之間，尋得一種持續而動態的平衡。

³⁴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iv.

三、理論與敘事的轉換：《文明社會史論》與《興衰史》中的歷史觀變化

對佛格森而言，羅馬的興衰歷程不僅是歷史研究的對象，更是一面反映公民精神盛衰的鏡子——而對於 1707 年後失去主權、亟欲重塑公民與文化認同的蘇格蘭而言，這種反思尤顯迫切。儘管佛格森堅定擁護英蘇聯合與漢諾威王朝，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仍更側重於培養公民的道德品格與公共精神，而非僅僅依賴制度設計。

在七年戰爭與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佛格森積極倡導復興蘇格蘭的尚武傳統，以凝聚國家認同，並重建軍隊的社會凝聚力。他深信公民身分與軍事力量的緊密連結，能抵消商業社會分工日益細化所造成的離心傾向。雖然這一構想終因財政負擔與潛在社會動盪而未能實現，但仍是蘇格蘭溫和派文人(the Moderates)維繫大英帝國聯盟的重要嘗試。對佛格森而言，腐敗不僅意味道德的淪喪，更從根本上反映公民政治參與的危機——一旦公民不再積極投入公共事務，共和國的衰亡便無可避免。因此，他主張透過制度與社會習俗，使公民即便身處商業社會，也能保有公民美德；他雖接受經濟分工的專業化，卻認為行政與政府部門的分裂才是共和腐敗的根源。

就領土擴張而言，佛格森在《文明社會史論》中已明確指出共和國危機的兩大成因：領土擴張與政治腐敗之間的關聯，以及公民風俗的日益敗壞。他與孟德斯鳩的看法一致，認為若各國能維持在小型共和共同體的均衡狀態，將能享有更為長久的福祉。他甚至推測，倘若羅馬的擴張止於義大利半島，其歷史進程將會截然不同。這一論斷奠定了佛格森對領土規模與政治制度關係的基本判斷，並為他在《興衰

史》中重構羅馬晚期的制度危機提供了理論前提。³⁵

然而，他的歷史反思並非出於單純的懷舊情懷。他清楚認識到，雖然公民美德與尚武精神曾促成領土擴張與物質繁榮，但歷史經驗——特別是羅馬的歷史經驗——證明這種理想難以持久。與孟德斯鳩相似，他認為龐大的帝國唯有藉由君主制，甚至專制政體，方能維持穩定。因此，無限的領土擴張幾乎必然將共和推向制度性的困境。這種對結構性問題的洞見，使他在《興衰史》中更側重分析制度變遷與公民風俗衰退的交互作用。³⁶

在《文明社會史論》中，他已確立對共和政治危機的根本判斷：政治秩序的崩潰並非歷史必然，而取決於公民美德與政治參與是否能持續。他特別將馬略於前 107 年的軍隊改革視為轉折點——取消服役的財產資格，使軍隊由公民武裝轉為將領的私人部隊，為內戰與獨裁統治打開了大門。這一制度分析為他在《興衰史》中論述羅馬軍事制度衰變提供了框架。佛格森對馬略改革的關注，不僅是對古代羅馬政治轉折的學術探討，更直接回應十八世紀蘇格蘭關於民兵制度的激烈辯論。他認為，馬略改革象徵公民放棄政治權利、默許軍事強人崛起，與溫和派對職業軍人壟斷防務的憂慮完全呼應。³⁷這種將古代經驗轉化為對當代帝國的道德與政治警示的方式，為他後來的羅馬史敘事奠定了批判性的判斷基礎。³⁸

佛格森理論體系中的另一個核心概念是「意外後果」(unintended

³⁵ McDaniel, *Adam Ferguson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60.

³⁶ 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ed. Fania Oz-Salzber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0.

³⁷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219.

³⁸ David Allan, *Adam Ferguson* (Aberdeen: AHRC Centre for Irish and Scottish Studie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2006), 97–105.

consequences)。這是蘇格蘭啟蒙時期極具影響力的一種因果解釋框架，並與他的反契約論立場密切相關。雖然部分詮釋將他視為個人主義或自發秩序理論的先驅，³⁹但較為謹慎的理解，應將其置於當時的歷史語境中觀察：政治制度的演變源於社會行動與衝突的長期積累，而非來自自由上而下的理性設計。值得注意的是，佛格森在闡述此一觀點時幾乎未涉及神學層面的論證，而是將制度的生成視為從家族組織發展至合法政治權威的自然演變過程。因此，在佛格森看來，意外後果的機制並非僅限於政治領域，而是推動整個社會秩序逐步成形的重要動力，其影響同樣體現在經濟與物質生活的變遷之中。歷史的進步並非源自某種先驗規劃，而是由眾多行動者於追求自身目的的過程中，在互動與衝突中共同促成。在此脈絡下，市場固然促進社會互動與物質繁榮，但並非歷史發展的主導力量。制度的建立往往是歷史行動的副產品，而非事先規劃的結果。他在一段經常為學者所引用的論述中明言：「社會的形式源於幽遠而晦澀的起源」，並且「出自本能，而非人類的思辨」而演進；「國家往往偶然建立起各種制度，這些制度固然是人類行為的產物，卻非出自任何個人的設計。」因此，社會契約論在他看來只是一種幻覺，「從未有任何憲法是透過協議所形成的，也從未有任何政府是依據某種計畫所仿製出來的。」⁴⁰這種立場重新定義了共和主義政治思想中「立法者」的角色，並為他在《興衰史》中處理羅馬制度史提供了方法論依據。⁴¹

這一歷史觀在佛格森分析羅馬的制度演變時表現得尤為鮮明。共和政治並非源於一套事先設計的政治藍圖，而是政治衝突、軍事改革

³⁹ Ronald Hamowy,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the Theory of Spontaneous Order*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

⁴⁰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19.

⁴¹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20.

與社會變遷交互作用的結果。例如，馬略的改革在無意間引發了對公民身分與共和穩定的深遠影響；羅馬的對外擴張亦出乎預期地導向帝國的建立，而非共和的延續。⁴²正如他所指出的，政府「源於人民的處境與天性，而非個別人物的計畫」。⁴³這意味著，即便是羅慕路斯(Romulus, c. 771–c. 717 BCE)這樣的奠基者，也無法為後世預先設計出穩定的政治體制。羅馬史所揭示的，是制度在歷史進程中的靈活性與脆弱性——這一點也成為他後期敘事中反覆強調的核心主題。⁴⁴

佛格森進一步肯定羅馬經驗的典範地位，並將其置於理論建構的核心歷史案例之中：「他們的君主被驅逐，以及圍繞君主特權與臣民權利所引發的問題，都與政治制度的建立及合法憲制的追求相契合。」⁴⁵因此，他以意外後果的視角重新詮釋羅馬的征服史。他認為，羅馬的偉大源於其愛國精神與尚武精神，這些皆是道德與意志的展現。然而，在軍事擴張的過程中，也潛藏著一種引發非預期後果的發展機制：

在他們的戰爭中，從最初時期直到歷史的最後階段，羅馬人並未刻意規劃他們所實現的眾多征服，或許也未曾預見征服遙遠行省將帶來何種利益，更無明確設想如何治理新獲得的領土。然而，他們仍不斷向前推進，逐步占領那些隨機出現在其掌控範圍內的地區。⁴⁶

這種分析不僅強調了意外後果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也展現了佛格森如何在歷史與政治思想之間建立聯繫。他關注的不只是羅馬如何征服世界，更在於這些征服如何反過來改造羅馬自身的制度與道德風貌。

42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219.

43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21.

44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21–122.

45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22.

46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47–148.

共和體制在擴張過程中逐步被侵蝕，軍事與政治權力的集中最終導致公民自由的衰落。

總結而言，《文明社會史論》中的羅馬史觀為佛格森分析政治衝突與制度演變提供了基本框架：它以意外後果的結構性分析為基礎，強調社會衝突的建構作用，並將軍事與公民身份的變化置於共和制度危機的核心。然而，這部著作仍以理論推演為主，歷史敘事僅作為佐證。與之相比，《興衰史》不僅延續了對公民美德與制度穩定的關注，更將分析重心轉向具體歷史情境下的道德抉擇與政治責任。從《文明社會史論》到《興衰史》的轉變，體現出佛格森試圖將抽象理論落實於具體歷史敘事的努力，也標誌著他在評價政治衝突時，從將其視其為社會進步的動力，逐步轉向警惕其演變為派系鬥爭與制度崩潰的危機。這一轉向正是理解他後期羅馬敘事的關鍵所在。

四、衝突與秩序的辯證：《興衰史》中的政治敘事與史學策略

本文所稱的佛格森「史學方法」，並非抽象的理論體系，而是指他在《興衰史》中處理歷史的具體技術與敘事策略。其核心特色包括：第一，多重史料的比較與批判。在敘述關鍵事件時，佛格森往往保留不同來源間的歧異，並加以比對與評註，展現他對史料真偽與可靠度的批判意識。第二，人物塑造與道德評價的結合。透過對性格與動機的分析，他以人物行動解釋歷史走向，延續古典史家的敘事傳統。第三，制度與社會背景的並置分析。佛格森關注制度如何隨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演變，藉此揭示歷史變遷的結構條件。第四，衝突與秩序的敘事張力。他在敘事中對比共和與帝制、派系鬥爭與社會穩定，藉以引導讀者思考制度與德性之間的平衡。第五，古典史學傳

統與十八世紀政治語彙的融合。透過場景化描寫，他結合古典史家的細膩鋪陳與當代政治語彙，使歷史重建與政治論述彼此呼應。下文將結合原文引述與分析，展示這些方法如何在《興衰史》的實際敘事中發揮作用。

值得強調的是，本文對《興衰史》的分析，並非僅止於呈現佛格森對羅馬歷史事件與人物的解釋，而是著眼於這些解釋如何體現其獨特的史學方法。換言之，佛格森對羅馬制度興衰、政治衝突與道德風尚的評述，並非孤立的歷史分析，而是透過特定的史料運用、敘事策略與評價語言來構成說服力。這種方法論層次的關懷，正是他與其他十八世紀羅馬史家(如休謨、羅伯遜、吉朋)的主要差異。更重要的是，這種史學方法與佛格森的政治思想並非相互分離的存在，而是彼此支撐：人物塑造與事件鋪陳的方式，直接承載了他對公民美德、制度穩定與權力運作的關懷。正因如此，本文雖在後半涉及佛格森的英國政治思想，實際上仍以其史學實踐為核心，藉由歷史敘述展現其政治理念的形成與運作。

在《興衰史》中，佛格森以羅馬共和國的興亡為敘事主軸，系統地將其社會理論轉化為宏大的歷史敘事。這部於 1783 年出版的作品，與休謨、羅伯遜等同時代史家所代表的啟蒙史學相比，更強調歷史人物在具體政治局勢中的行動抉擇與道德判斷，而不僅僅依賴制度結構的解釋。佛格森筆下的羅馬精神並非單純的軍事尚武，而是一種深植於道德與制度中的公民美德。他指出，羅馬人在早期「將戰爭視為人類品格的核心表現，而擊敗敵人則是其最重要的成果」，但這種尚武精神並未與法治相悖，反而促使羅馬建立嚴格的軍事與政治規範。⁴⁷正如他所言，羅馬的勝利「並非純粹依賴軍力，而是來自國家對公民

⁴⁷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

道德與紀律的鍛鍊」。⁴⁸這種精神既塑造了羅馬的軍事優勢，也維繫了它在擴張過程中的社會凝聚力，使其能持續吸納新公民，而不致因內部分裂而衰敗。

在追溯羅馬歷史發展的成因時，佛格森不僅將原因歸於人民的風俗與公共精神，也探討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軍事與思想層面的變遷。他關注的不僅是羅馬制度的設計，更在於這些制度如何隨環境變化而調整與演變。例如，羅馬早期的殖民政策雖然促進了領土擴張，但也引發了對公民身分與忠誠的挑戰：「殖民地與羅馬之間的聯繫並非總是穩固，因為殖民地的居民尚未學會如何在遠離羅馬本土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對共和國的忠誠與認同。⁴⁹這說明，羅馬制度雖然塑造了強大的國家精神，但在處理擴張過程中的社會變遷時，卻同時必須面對忠誠與制度適應性的挑戰。基於此背景，本節將先討論《文明社會史論》與《興衰史》之間的連續性，進而轉向幾個關鍵議題，探討這兩部作品在公民品格、國家精神與制度發展上的根本性差異。

佛格森在《興衰史》中，延續他在《文明社會史論》中的論述，將公民美德與公共精神視為政治秩序的核心。他認為，政治參與以及對公共福祉的承擔構成共和制度的基石，任何背離這些價值的趨勢都會導致社會失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對伊比鳩魯學派(Epicureanism)的批評。他認為該學派在卡提林陰謀(Catiline Conspiracy)之後，⁵⁰進一步助長了倫理與政治的極端化傾向。佛格森認為，伊比鳩魯學派的哲學宣稱

48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

49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

50 卡提林陰謀發生於公元前 63 年，是羅馬共和晚期的一場政治陰謀，由貴族盧基烏斯·塞爾吉烏斯·卡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 108–62 BCE)領導，企圖以暴力奪取政權。此事最終被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E)揭露並成功挫敗，後來更成為論述羅馬共和政治腐敗與道德崩壞時最具象徵性的事件之一。

「一切善皆屬於個人」，這種觀點與公民美德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相較之下，斯多葛學派(Stoicism)更符合共和制度的道德要求，因為它主張「不存在獨立於公共利益之外的個人之善」。⁵¹基於這樣的哲學立場分野，佛格森將凱撒視為伊比鳩魯主義者，並以傳統上以斯多葛哲學著稱的小加圖(Cato the Younger, Marcus Porcius Cato, 95–46 BCE)作為斯多葛主義的典範人物，後者「以他人追逐野心、快樂或個人利益的同樣熱誠，奉獻於共和國的事業」。⁵²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加圖的這段描述中出現了關鍵詞「野心」，這引出了佛格森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關鍵概念。野心是佛格森政治語彙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整個新馬基維利主義政治話語的關鍵要素。如同馬基維利，他並不將野心視為罪惡，而視之為人性中無法根除的驅力。關鍵在於如何加以引導，使個人野心與政治美德相容並行。在《文明社會史論》中，他曾正面評價野心：「野心、對個人成就的熱愛，以及對名聲的渴望，雖然有時可能導致犯罪，但它們總能驅使人們投身於需要卓越才能與堅韌意志支撐的事業。」此外，他也指出：「然而，若這些動機確為驅使人們投身國家服務的主要力量，那麼它們的減弱或影響力的下降，便構成了國家風尚真正的腐化。」⁵³這表明，野心本身不必然為害，惟有透過適當引導，方能使其服務於公共利益。

在《興衰史》中，佛格森進一步深化了這一觀點。他認為，野心本身並不必然導致腐敗，因為羅馬人對公共職務的渴望，往往與為祖國增光的意圖相結合。只要這種野心能與公共利益保持一致，它便能成為共和政治運行的正面動力。然而，當羅馬征服馬其頓後，職位與

⁵¹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70.

⁵²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70.

⁵³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244–245.

行省治理權力開始被「既因野心，亦因貪婪而覬覦」，⁵⁴野心逐漸變質為腐化的驅力。貪婪，亦即對個人利益與享樂的無度追求，使野心由促進公共福祉的動力，淪為社會紛爭與制度腐化的根源。當野心失去公民價值約束時，便滋生貪婪，加速國家腐敗，最終摧毀共和體制。

佛格森在處理羅馬人物與事件時，展現出獨特的評價視角與敘事風格，這一點可從他對平民階層野心的分析中清楚看出。野心作為人對社會地位的本能渴望，其對平民階層的深刻影響並不令佛格森感到意外。在他看來，共和危機的開端，正是平民階層從公民群體蛻變為黨派組織，其領袖不再以國家利益為依歸，而轉為受個人權力慾望所驅使。馬略的例子正典型地說明了這一轉變：他受「無節制的權力渴望」支配，對貴族階層的仇恨最終演化為對國家的離心傾向。⁵⁵喀提林陰謀後的政治生態進一步惡化，私人利益開始主導政治決策，而所謂的「民眾政府」(popular government)之名，則淪為專制權力的幌子。⁵⁶

馬略的軍制改革作為共和危機的轉折點，在佛格森的敘述中具有決定性意義。他將馬略描述為「狡猾而大膽的冒險家」，指出他無視「禁止生活困苦的公民服役於軍團的法律，並在人民的這一階層中找到了大量願意應徵的新兵」。⁵⁷佛格森強調這一措施是「羅馬國家中一個顯著而危險的創新」，並「經常被提及為加速其毀滅的步驟之一」⁵⁸。

到了龐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 106–48 BCE)與凱撒的時代，政治對立已經完全脫離了社會階層的界限。隨著貴族與平民的界線逐漸模糊，權力鬥爭轉而集中於個人領袖之間的競爭。佛格森特別以龐培為例，指出

⁵⁴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80.

⁵⁵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287.

⁵⁶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69.

⁵⁷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04.

⁵⁸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04.

他性格中的根本矛盾：他形容這位年輕將領「對共和國抱有過多的尊重，不願以暴力手段來摧毀它」，卻「被虛榮心和對自己個人聲望的嫉妒所支配，這種心態在各種細節上不斷引導他破壞共和國的根基」。⁵⁹在佛格森看來，龐培的矛盾正象徵著共和晚期政治家的困境——他們在維護舊秩序與追求個人權力之間搖擺不定。而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138–78 BCE)的先例，則成為後來野心家的危險範本：

蘇拉的例子——他通過軍事力量使自己成為國家的主宰——在激發後人對統治權的渴望上，其影響遠比他運用權力時的政治目的，或他辭職時所展現的寬宏氣度更為深遠；後者無法約束或抵消這一危險先例所帶來的誘惑。⁶⁰

貪婪與虛榮心的致命結合——以凱撒為代表——摧毀了共和制度的最後防線。早在凱撒年輕時，蘇拉就敏銳地預見了這個人物的潛在危險，他曾警告說：「當心他！在那個年輕人身上，有許多個馬略。」⁶¹這場決定性的對抗暴露了共和末期政治的真實本質。佛格森指出，新一代的權力野心家「並非出於一時的意氣，也不再關心黨派或共和的整體利益，而是以冷靜與算計的態度，在顛覆國家政體的過程中，滿足自己的野心與貪婪」。⁶²在他看來，這些政治人物的危險之處，不在於情緒的激烈或行動的魯莽，而在於他們以理性的算計推動毀滅性的行動。當權力的爭奪取代了制度內部的政治競爭時，共和國的命運便已註定走向覆亡。這一衰敗的模式體現了佛格森政治思想的核心關懷：當個人野心失去道德與公民責任的約束，制度的崩壞將無可避免。

領土擴張與制度危機的惡性循環進一步加深了共和體制的內在

59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35.

60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38.

61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37.

62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38.

矛盾。延續《文明社會史論》的核心論點，佛格森在《興衰史》中深入剖析了帝國政策如何加速內部腐化。地中海行省雖為羅馬帶來龐大財富，卻同時成為腐敗滋生的溫床。由於羅馬公民多不願遠赴海外定居，遙遠的行省只能依賴常備軍維持統治，使政治權力逐漸軍事化，並偏離以公民參與為核心的共和原則。更為關鍵的是，領土擴張並未改善底層公民的生活條件。羅馬版圖的擴大，並未帶來資源的平均分配，反而加深了貧富差距與社會不滿。行省財富的集中與不均，吸引大量外來人口湧入羅馬城，擾亂勞動市場並衝擊公共秩序。當對外擴張這一傳統的社會壓力釋放機制逐漸失效時，長期被轉移到外部的矛盾重新集中於國內，並最終動搖了共和體制的根基。⁶³社會不滿情緒的積累為格拉古兄弟等民粹領袖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然而，黨派之爭並未阻止羅馬的持續擴張，反而為其提供了新的動力。佛格森在《興衰史》中重申了一種可追溯至李維、普魯塔克(Plutarch, c.46-125)及馬基維利的傳統觀點：共和國對外戰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內部分裂所激發的競爭機制。將領們競相透過軍事勝利來提升政治影響力，這種現象使國家的擴張動力得以維持。⁶⁴

蓋烏斯·格拉古擔任護民官期間，黨派鬥爭達到新的高度，但國家軍事行動並未因此停滯。佛格森特別指出了這一時期的矛盾現象：

蓋烏斯·格拉古擔任護民官之時，最為同時代與後世所注意者，是其派系鬥爭與政治動員所造成的局勢動盪。然而，也有人指出，他在任內推動了多項公共工程，在義大利各地修築橋樑、道路和其他公共設施。同時，羅馬軍隊首次越過阿爾卑斯山，成功

⁶³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84.

⁶⁴ Craig Smith, *Adam Ferguson and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204–208.

結束與高盧薩利人(the Salyii)的戰爭，其領土遂成為羅馬在該地的第一個行省。⁶⁵

格拉古改革對行省總督的任命制度進行了重要調整，使軍事指揮官不再完全由元老院任意指派，而須遵循更透明、具程序性的機制。佛格森指出，蓋烏斯·格拉古在這項新制度中意圖限制貴族對行省的壟斷：「格拉古提出或被歸因於他的下一道法令，涉及任命官員治理行省的程序；若能嚴格執行，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補救前述弊端。任命此類官員的權力仍委託給元老院，但具體安排須於執政官選舉之前，每年事先確定。」⁶⁶這項改革嘗試以制度化的程序防止元老階層藉職權謀取私利，也顯示格拉古企圖恢復公民對政治運作的信任。

然而，佛格森認為，共和國此時已深陷體制性衰敗。格拉古兄弟推行的改革觸動了貴族與元老院的利益根基，其死亡象徵政治暴力取代了制度協商。佛格森深刻地觀察到羅馬政治文化的轉變：「羅馬人在追求對外征服時如此慷慨地濺灑異族之血，如今卻同樣能毫不猶豫地對自己的同胞下手。」⁶⁷這場內戰的殘酷，不僅揭示了共和政體的崩潰，更象徵羅馬人已喪失維繫共同體的道德與制度基礎。

在佛格森看來，羅馬的擴張決定了其由共和制邁向君主制的歷史必然性，而這一轉變只能透過內戰的劇烈動盪來完成。建立君主政權遂成為結束無休止派系衝突與政治暴力的唯一可行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佛格森對某些集中權力的舉措持審慎的認同態度。他對蘇拉的政治行為提出了深刻而具層次的評析，指出：「在蘇拉首次以軍事力量進攻羅馬城時，他的整個行動顯示，他的目的是拯救共和國免於馬略

⁶⁵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95.

⁶⁶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96.

⁶⁷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35.

的篡奪，而非為自身奪取政權。」⁶⁸換言之，佛格森認為蘇拉雖以軍事手段干預政治，但其初衷並非謀求個人權力，而是試圖在共和體制瀕臨瓦解之際，以非常手段恢復合法秩序。佛格森進一步為蘇拉的行爲辯護：「當他從米特里達特戰爭(The Mithridatic War, 89–85 BCE)返回義大利時，各黨派已陷入敵對狀態；那些假借共和之名而行暴政的人，正好證明他訴諸武力的正當性。」⁶⁹當龐培被任命為唯一執政官時，佛格森甚至認為：

龐培身為唯一執政官，將法律賦予的權威與他一向追求的個人崇高地位結合於一身，因此握有近似真正君主的影響力與政治分量。或許，假如他能使這種尊榮成為世襲，並納入共和國的體制，形成一種適度的君主混合政體，對國家而言反而是一種福祉，因為共和制度在當時確實亟須這樣的調和。⁷⁰

然而，佛格森清楚指出：為維繫政治秩序而集中權力，與走向暴君式專斷統治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在論及凱撒於高盧(Gaul)的統治時，他特別強調，依羅馬法令的設計，統帥欲競逐執政官，必須先遣散軍隊並親赴羅馬，以避免軍事指揮權與最高民政權力合而為一。然而，凱撒藉由延長其軍事統轄權，使自己同時掌握軍事、行政、立法與司法權，幾乎缺乏任何制度性制衡，個人意志遂凌駕於法律與共和體制之上。⁷¹佛格森認為，這種無限制的權力併攬，違背共和政治的基本原理，也與孟德斯鳩所強調的權力分立原則相牴觸。對他而言，此類統治並非秩序復甦，而是政治墮落的徵兆。

⁶⁸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98.

⁶⁹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35–136.

⁷⁰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226.

⁷¹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226.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奧古斯都所採取的策略。他在重建皇權的同時，刻意維持共和制度的名義外觀。佛格森指出，在羅馬，公然奪取王權仍被視為不可容忍的僭越，不僅破壞共和的制度象徵，也侵犯眾多依其家族地位或個人德行而自認享有政治尊榮的公民之既有主張。因此，屋大維不接受國王或獨裁官的頭銜，而選擇透過既有官職權力的累積來鞏固統治。

佛格森明確指出：「共和時期的一切可能權力，皆已包含在執政官、監察官、烏占官、大祭司與護民官等頭銜之中。」⁷²而且，在共和體制下，本就沒有法律禁止這些尊位集中於同一人之手；關鍵只在於，單就其中任何一職而言，已足夠不易取得。於是，只要能將這些職位與權能集於一身，便足以構成一種專制權力，而無須創設新的官職形式，亦無須假借獨裁官之名。相較於凱撒的公然專斷，奧古斯都以制度原有框架為外衣，將分散於不同官職的特權悄然整合於個人身上，其策略既符合他一貫展現出的謹慎政策與假裝謙遜的姿態，也更能掩飾權力本質已然發生的巨變。⁷³因此，在佛格森的政治思想中，奧古斯都是一個深具悖論性的歷史人物：他既象徵共和制度的終結，又體現政治現實主義的圓熟勝利。

佛格森注意到，羅馬轉變為帝國後，確實為多數公民帶來了更穩定的生活與更寬裕的物質利益。然而，他強調，這些收穫是以政治自由為代價取得的。皇帝刻意保留下共和的制度形式，並在公開場合尊重元老院與公民大會，使人民誤以為自身的政治地位依然穩固，而不察覺實權已落入單一統治者之手。佛格森指出，奧古斯都透過維持古共和的制度形貌，「讓人民誤以為自己仍保有完整的政治地位，使他

⁷²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07.

⁷³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07.

們甘於接受已然墮落的屈從處境」⁷⁴；當公民仍以為自己是國家主人時，實際上已在服從之中失去了自由。

在佛格森看來，奧古斯都的統治展現了極具警示性的政治悖論：共和制度在龐大帝國的架構下已無力運作，元老院與公民大會雖仍以傳統形式存在，實際上卻只能順從皇帝的意志。同時，奧古斯都巧妙利用共和語彙與制度符號——選舉、議政與公民身分——營造自由未失的假象，使人民在日常安穩生活中逐漸接受服從。這種統治方式不以強制為外貌，而以合法性作掩護，讓政治參與意識隱而不見，自由的喪失也不再引發警覺。佛格森認為，最令人畏懼的專制，不是暴力奪權，而是在公共利益與法律的名義下悄然擴張，使人心甘情願放棄共和精神。奧古斯都的政治模式正是這種危機的先例：它不摧毀制度，而是奪取制度，使自由在制度仍在之時便已崩解。

在十八世紀的語境下，這類歷史敘述無須被視為對具體事件的評論，而更應理解為對現代國家運作中潛在風險的整體反思。隨著軍事與財政、行政體系的不斷擴張，中央權力雖能維持政治制度的外在形式，卻可能在此過程中逐步侵蝕制衡機制，導致自由在穩定的名義下被悄然削弱。佛格森以羅馬史為隱喻，向同時代讀者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在一個日益複雜且依賴強力行政管理的商業與殖民社會，如何在追求效率與穩定的同時，避免將公民自由讓渡給日益集中的行政權力。

奧古斯都的統治模式，是佛格森與吉朋歷史敘事中最具共通性的主題之一。兩人雖未直接對話，但在對羅馬政治轉型的理解上展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儘管佛格森從未在《興衰史》中明引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他對奧古斯都的評價卻與吉朋極為接近。佛格森認為，奧古斯都「建立了一種專制政體，表面上以共和之名施行，並讓人誤

⁷⁴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07.

以為這只是臨時性的權力安排，實則逐步鞏固為長期的君主統治，毫無任何混合政體的特徵」。⁷⁵吉朋則以簡潔有力的筆法指出，奧古斯都的帝制本質上是一種「偽裝成共和的絕對君主制」。⁷⁶兩位史家都強調了奧古斯都在維持共和體制外觀的同時，巧妙地將實際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上。

佛格森的分析不僅記錄了共和體制的瓦解，並深入探討了政治轉型的內在邏輯。他承認奧古斯都帶來的穩定，但同時警惕專制制度如何削弱公民參與以及自由競爭的空間。這種兼具歷史與哲學的雙重視角，使他的敘述超越了吉朋的分析框架，展現出更深的政治哲學意涵。然而，他的關切不僅限於政體變遷，還進一步探討社會衝突如何影響政治秩序。與《文明社會史論》相比，《興衰史》對動亂與黨派對立的批判更為強烈，標誌著他對共和主義理論的重要修正。

透過對羅馬由共和走向帝制的細緻分析，佛格森藉此建構出一套關於政治衰亡的系統性敘事：從馬略軍事改革到奧古斯都的制度創新，從領土擴張的矛盾到黨派鬥爭的激化，這些事件在他筆下被編織成緊密相連的因果鏈條。更重要的是，這些歷史情節的鋪陳與評價，始終承載著他對共和政治基本原則的深層反思。換言之，佛格森的史學方法——包括史料取捨、敘事結構與評價語言——與其政治理念密不可分，兩者相互塑造。因此，以下對佛格森政治立場轉向的探討，並非另闢新題，而是延續前述方法論觀察，進一步揭示他如何透過歷史書寫，回應十八世紀英國的政治關懷。這一討論同時呼應前文對《文明社會史論》與《興衰史》的比較，說明佛格森在史學方法與政治立場上的變化並非平行發展，而是彼此交織、相互形塑的過程。

⁷⁵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11.

⁷⁶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1, 109–110.

五、從衝突到秩序：《興衰史》中佛格森政治立場的轉變

從《羅馬共和興衰史》對羅馬共和興亡的敘事中可以看出，佛格森的政治立場隨著歷史情節的推進而逐步展現。這種立場的變化，正是他在不同歷史階段與題材中實踐其史學方法的具體體現，而非脫離史學討論的另起新題。換言之，他在事件取捨、敘事安排與評價語言上的選擇，本身即構成其政治理念的表達。若回溯至 1767 年的《文明社會史論》，佛格森在其中明確肯定政治衝突的積極作用。他指出：「人類不僅在自身處境中發現分歧與紛爭的根源；他們似乎天生懷有敵意的種子，並以熱切而愉悅的心情擁抱對抗的機會……人也傾向於對抗。」⁷⁷更重要的是，他將衝突視為文明進步不可或缺的條件：

如果沒有國家之間的競爭與戰爭的經驗，市民社會本身恐怕難以確立其存在的目的或形態……去震懾、去威嚇，或在理性無法說服時以剛毅抵抗，正是使強健心智獲得最激昂的活動與最高的勝利之所在；而從未與他人有所爭鬥的人，便對人類情感中至少一半的面向毫無所知。⁷⁸

然而十六年後出版的《興衰史》，佛格森幾乎完全摒棄這種樂觀態度，轉而強調動亂的破壞性，並嚴厲批評平民派及其領袖，視之為共和腐化與分裂的根源。

這種立場轉變在佛格森對羅馬政府體制的分析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與馬基維利不同，佛格森並不認為羅馬共和國是一個通過吸納不同社會階層而達成政治平衡的成功典範。他指出，羅馬制度自公元前 451

⁷⁷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25.

⁷⁸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28.

年設立十人委員會(Decemviri)與公元前 449 年頒布《十二銅表法》(*The Laws of the Twelve Tables*)以來，便已埋下制度性的缺陷。這兩項改革雖被後世視為共和早期的重要里程碑，但在佛格森看來，正是這些制度設計為日後貴族與平民之間的權力爭奪奠定了根源。他由此提出了一種與傳統共和主義截然不同的制度設計理念，認為賦予平民與元老院相抗衡的立法權是一種根本性錯誤，在他看來，更合理的安排應是賦予平民監督與修正貴族法令的權力，而非直接的立法權。在佛格森的政治理論中，權力並行只會導致政府運作的癱瘓，使原本旨在調和社會對立的制度安排，反而成為激化衝突的根源。

佛格森對平民政治的批判立場，最清楚地體現在他對護民官制度的評價中。他追溯制度的起源，指出當平民因債務問題遭受貴族壓迫而退避至聖山(Sacred Mount)時，「下層人民幾乎完全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很快便發現，在這種體制下，他們所受的壓迫甚至比他們所推翻的國王統治時期更為嚴酷。」面對平民的抗議，平民代表堅持：「你們的執政官並非真正代表整個共和國，而只是某一派系的領袖。」⁷⁹然而，佛格森對這一制度創新的效果持深度懷疑。他指出，元老院設立護民官的原意在於平息黨派間的敵意，但實際上「卻使雙方的爭端更加勢均力敵，並且擴大了爭論的範圍」。護民官們「不僅積極替平民辯護，還不斷提出新的權利要求……每當護民官換屆時，繼任者往往會試圖透過推動新的改革，來確立自己的政績」。更糟糕的是，「他們甚至干預國家決策與軍事行動……幾乎在每一次政治爭端中，護民官們都像是在政府機制的運作中設下障礙。」⁸⁰佛格森的這一判斷反映了他對民主參與成效的根本懷疑。他認為，擴大政治參與往往加劇而非化解社會矛盾。

⁷⁹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7.

⁸⁰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8.

佛格森對民主政治效果的懷疑，不僅針對古代羅馬，也隱含對近代共和主義傳統的反思。對他而言，羅馬歷史並非遙遠的古代案例，而是檢驗共和理論現實可行性的試驗場。正因如此，他的羅馬敘事同時構成對十七世紀英格蘭共和主義的一種回應與修正。在英格蘭共和主義的思想傳統中，阿爾傑農·西德尼(Algernon Sidney, 1623–1683)、亨利·內維爾(Henry Neville, 1620–1694)與華特·莫伊爾(Walter Moyle, 1672–1721)等人普遍將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視為維護共和秩序的努力。雖然他們對改革成敗的理解不盡相同，但整體上皆肯定格拉古的政治動機，並視其為公民德性對抗貴族腐敗的象徵。然而，佛格森認為，若僅以道德動機去解釋政治改革，便可能忽略制度層面的風險，這正是他希望介入並修正之處。

比起改革者的政治德性，佛格森更關注制度的延續與政治秩序的維繫。正是在羅馬土地法爭議的案例中，他提出了與英格蘭共和主義者不同的警告：政治改革若脫離制度的漸進原則，無論其出發點多麼正義，都可能導致公共秩序的崩潰。因此，佛格森在評價斯普里烏斯·卡西烏斯(Spurius Cassius, c. 542–485 BCE)的土地改革時指出，此舉不僅「威脅富人財產的安全」，更「使所有羅馬公民感受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危機」，因為卡西烏斯「提議向所有外邦人賦予羅馬公民權，使來自拉丁各城邦的外來者湧入羅馬，並參與人民大會的投票」。最終，「國內各派勢力聯合起來反對他，卡西烏斯被控叛國罪，並遭判死刑。」⁸¹佛格森將此類改革視為對政治秩序的威脅，而非共和美德的體現。這樣的立場，顯示他已從傳統強調衝突促進德性的觀點，轉向維護秩序與制度穩定的取向。也正因如此，他在敘述中對元老院的同情尤為明顯——並非出於對貴族權力的支持，而是認為貴族議會象徵著政治節制與制度

⁸¹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8.

連續性，是防止共和陷入民粹動盪的必要平衡力量。

在評價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時，佛格森承認其主張不乏合理性，但認為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下「極為不合時宜」(extremely unseasonable)。⁸²這樣的評價反映出他對改革行動的根本懷疑——在他看來，任何脫離制度節制、訴諸群眾激情的政治運動，最終都將破壞共和的穩定。格拉古兄弟時期的政治騷亂，在佛格森筆下象徵羅馬內部衝突達到頂點。他在 1783 年出版的《興衰史》中，透過對羅馬歷史的分析，明確與這類訴諸群眾激情、動搖既有制度的行動劃清界線；其批評雖然指向古代羅馬的政治危機，但在美國獨立戰爭甫告終、帝國秩序受到多數群體挑戰的情勢下，這一敘事立場無疑反映出他對群眾政治的警惕與不安。在這樣的背景下，佛格森更強調，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階層差異是任何國家穩定運作的前提，維持公共秩序則遠比追求名義上的平等更為重要。在這樣的思路下，格拉古的行動在佛格森眼中不再是公民美德的表現，而是通往混亂的徵兆——他甚至指出，這些改革預示著「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因此「元老院採取的暴力解決方式似乎是必要的」。⁸³這種評價，進一步凸顯佛格森與馬基維利傳統共和主義之間的根本分歧：在佛格森的政治哲學中，秩序與節制優先於自由與衝突。

雖然《興衰史》在方法上延續了馬基維利式的政治反思，強調透過歷史檢驗制度運作與權力平衡，但與《文明社會史論》相比，佛格森已不再將衝突視為自由與國家強盛的主要動力。此一立場上的調整，與 1767 年至 1783 年間接連發生的政治動盪密不可分。美國獨立戰爭暴露出群眾以自由與主權之名挑戰既有秩序時可能引發的破壞，使他意識到政治能量若脫離制度節制，將導致文明自身的消解。因此，

⁸²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85.

⁸³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85.

他愈加強調，政治秩序與制度約束乃文明延續的必要前提；衝突若失去界限，就會從維護自由的力量轉化為危及國體的風險。與其他蘇格蘭溫和派代表人物相同，佛格森堅決反對北美殖民地的政治訴求，全力支持維護漢諾威王朝的政權與帝國秩序。⁸⁴對蘇格蘭統治菁英而言，殖民地叛亂恰好提供了一個展現對大英帝國忠誠的契機，也使他們能進一步融入帝國的行政與軍事體系。

佛格森不僅在學術上關注政治秩序的問題，也曾直接參與英國政府與北美殖民地代表之間的談判，試圖在大西洋兩岸的危機中尋求調和。他對美國革命的介入，最初源於對理查·普萊斯(Richard Price, 1723–1791)《論公民自由的本質》(*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1776)的批判——這部著作後來被視為美國革命思想的重要宣言。在英國政府高層的支持下，並經約翰·達爾林普爾爵士(Sir John Dalrymple, 1726–1810)居中斡旋，佛格森於同年在倫敦出版了《關於普萊斯博士近期出版小冊子的評註》(*Remark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Price*)。⁸⁵這部作品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揭示了英國思想界對殖民地自由論述的回應，更關鍵的是，它反映了佛格森在此時期對羅馬歷史的全新理解。在美國革命的時代背景下，羅馬共和國不再只是公民美德與自由政治的象徵，而成為群眾政治與制度瓦解的警示。佛格森藉此重新審視共和主義的傳統，從早期以衝突為文明活力來源的立場，轉向以秩序與節制為維繫

⁸⁴ Iain McDaniel, *Adam Ferguson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185–186; Richard B. Sher, *Church and Universit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Moderate Literati of Edinburg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8–209.

⁸⁵ Ronald Hamowy, “Scottish Thought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dam Ferguson’s Response to Richard Price,” in *Liberty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David Womersle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7), 360–361.

政治穩定的核心原則。

在《評註》中，佛格森直接回應普萊斯對自由的界定，並以羅馬歷史作為論證基礎。麥丹尼爾指出，佛格森對普萊斯的主要批評在於後者將自由等同於權力，從根本上混淆了政治概念的層次。佛格森承襲法蘭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對「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的區分——前者意味著公民在政治共同體中的積極參與，後者則是免於任意支配的安全保障。⁸⁶因此，他明確指出，政治參與和公民自由不可混為一談，並以羅馬為例說明：「當羅馬元老院的所有權力被轉移至民眾大會時，羅馬的自由便告終結。」⁸⁷在他看來，訴諸群眾意志、使政治決策脫離制度節制，將削弱理性與約束的原則，最終導致制度崩潰與自由的瓦解。

正是在這樣的警惕下，佛格森在《評註》中明確提出其政治哲學核心：「政治自由的本質，就是這樣一種體制——它賦予智者以權力，給所有人以安全」。⁸⁸真正的自由並非來自無限制的民主動員，而取決於制度能否防止人性弱點的濫用。在他看來，民眾必須「防止他們自己的愚蠢和錯誤的影響，就像防止任何其他人的侵犯一樣」。⁸⁹這樣的政治原則出發，佛格森進一步論證了他對大英帝國性質的理解。他主張，英國憲制之所以卓越，正在於它在自由與秩序之間達成了平衡。英國的政治體制「在許多方面都優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已知的憲制」，並且「實際上賦予其臣民比任何其他已知民族所享有的更高程

⁸⁶ McDaniel, *Adam Ferguson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190–191.

⁸⁷ Adam Ferguson, *Remark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Price: Intituled,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London, 1776), 14.

⁸⁸ Ferguson, *Remark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Price*, 8–9.

⁸⁹ Ferguson, *Remark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Price*, 8.

度的自由」。⁹⁰在殖民地代表權問題上，佛格森進一步延伸這一論點，主張政治自由並不取決於地理距離，而在於臣民是否能在制度內獲得代表權。他反駁美洲殖民地以自由為名的抗議，指出北美人即便「遠隔三千英里的海洋，也可以通過派遣代表到大不列顛議會而享有其自由」。⁹¹這種「名義代表制」(virtual representation)的主張，正呼應佛格森在《興衰史》中的觀點：真正的政治自由並不取決於形式上的參與，而在於制度能否維持秩序並保障公民的安全。

與普萊斯不同，佛格森強調政治穩定的維護重於革命權利的訴求。他既不完全接受馬基維利式的動亂觀，也不同意普萊斯將美國革命視為民主進步的自然結果，而是傾向於將這場衝突理解為政治權力結構變動的產物。這種對動盪的保守態度，使他在思想上與蘇格蘭溫和派保持一致。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主張以聯邦式代表制調和英美矛盾的立場不同，⁹²佛格森在《評註》中更強調革命帶來的體制性危險。他透過羅馬史的例證指出，共和的崩潰往往並非源自暴君篡奪，而是附屬群體在追求政治平等時破壞了原有秩序。正因如此，在討論羅馬同盟者戰爭(the Social War, 91–88 BCE)時，他特別強調：盟邦擴大公民權的要求，被當時每一位理性之人視為足以導致「動亂與國家敗亡」的危險訴求。⁹³羅馬最後的衰敗，並非如普萊斯所暗示的那樣因為拒絕此要求，而正是因為過度擴張人民權力，使自由在權力膨脹中反而走向消失。藉由將羅馬同盟者戰爭與美國獨立戰爭並置，佛格

⁹⁰ Ferguson, *Remark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Price*, 13.

⁹¹ Ferguson, *Remark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Price*, 11.

⁹² Donald Winch, *Riches and Pover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ritain, 1750–18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2–144.

⁹³ Ferguson, *Remark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Price*, 51.

森主張，二者的根本問題皆在於附屬社群對政治參與權的訴求，以及主體政權是否具備維持統一與制度節制的能力。⁹⁴他在敘事中靈活運用內戰與同盟者戰爭的概念對照，藉以說明衝突如何在不同條件下產生截然相反的結果：制度脆弱之時，衝突促成政治崩解；唯有在制度穩固的情況下，它才可能成為國家更新的契機。

然而，這並不表示佛格森對政治衝突持僵化的否定態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 1792 年出版的《道德與政治科學原理》(*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中，依然肯定政治競爭與衝突在維繫自由政體中的重要功能。⁹⁵這表明他對衝突作用的理解具有情境性特徵，會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和政治需要進行調整，而非固守單一立場。《興衰史》反映的是他在特定歷史時刻——面對美國革命與帝國危機——對政治穩定的特別關切，而非其政治思想的根本轉變。正因如此，佛格森的史學與政治理論展現出一種靈活的方法論，使他能在不同政治語境中選擇適切的理論資源，既不否定衝突的建設性作用，也不讚頌其破壞性的後果，而是在秩序與動盪之間尋求平衡。

綜觀佛格森的史學發展，《興衰史》的敘事重心已從早期強調政治衝突如何促進共和政體活力的觀點，轉向探討制度如何在社會變遷與權力重組的壓力下調適、失衡，最終走向崩解。這種敘事策略的轉變，並非佛格森政治立場的根本改變，而是其史學方法在面對不同歷史主題與政治語境時的靈活運用與再思考。在美國革命所引發的帝國危機中，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出現明顯分歧：斯密主張以聯邦式代表制化解英美矛盾，而溫和派文人則憂慮革命造成的政治失序。佛格森身

⁹⁴ Ferguson, *Remark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Price*, 51–52.

⁹⁵ Adam Ferguson,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Being Chiefly a Retrospect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College of Edinburgh*, 2 vols., vol. 2 (London: A. Strahan and T. Cadell, 1792), 510–512.

處其中，選擇性地吸收不同政治論述的元素，並藉由羅馬史的敘事對當代動亂進行審慎評估。他透過歷史對比，將羅馬共和的崩解視為一種現實警示，指出自由若失去制度與德性的約束，終將自我毀滅。

因此，《興衰史》不僅是十八世紀共和體制政治論爭的一部分，更體現了佛格森對史學方法本身的深刻反思。他將歷史書寫視為一種介入現實政治的理性實踐——透過敘事比較與道德分析，揭示秩序與自由、衝突與穩定之間微妙而持續的張力。這種史學觀使佛格森在十八世紀思想界中佔據獨特位置，也使《興衰史》成為理解啟蒙時代政治哲學與歷史意識互動的關鍵文本。

六、結論：佛格森的歷史視角與敘事策略

《興衰史》與《文明社會史論》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對政治衝突的評價轉變上，更根本地體現在史學體裁與敘事方法的分歧。佛格森在其未刊論文〈論歷史及其適當的風格〉(“Of History & Its Appropriate Stile”)中，明確區分了「描述性歷史」(Descriptive History)與「敘事性歷史」(Narrative History)：前者著重於共存事物的靜態狀態，後者則關注事件在時間中的演進。這一區分並非單純的文體問題，而是體現了佛格森對歷史因果理解的深化——從探討社會發展的結構性規律，轉向關注個體行動在特定歷史時刻的道德與政治意涵。⁹⁶

作為一部旨在描述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歷史著作，《文明社會史論》主張文明社會依循自然歷程演進，並在此過程中孕育出最適合自

⁹⁶ Annette Meyer, “Ferguson’s ‘Appropriate Stile’ in Combining History and Science: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Revisited,” in *Adam Ferguson: History, Progress and Human Nature*, ed. Eugene Heath and Vincenzo Meroll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 131–146.

身的制度；政治衝突因而被視為制度創新與社會進步的內在動力。相較之下，《興衰史》則更注重敘事與判斷，將焦點從宏觀發展的客觀規律，轉移至行動者的道德抉擇與政治責任，凸顯個人與制度之間的張力。佛格森不再關注衝突如何推動制度演變，而是揭示野心與腐化如何從內部侵蝕政治秩序，最終導致共和體制的瓦解。儘管他仍保留早期階段論的分析框架——例如將早期羅馬人歸為已具財產制度與政治從屬關係的「粗鄙人」(barbarians)⁹⁷——但這些有關制度與風俗的比較觀察，在《興衰史》中已退居次要地位。歷史的主體不再是整體社會的演進，而是具體人物在道德與政治抉擇中的行動。透過這種轉向，佛格森將歷史書寫從一種關於文明發展的理論，轉化為對人性與政治德性的道德省思。

這種方法論上的轉換揭示了佛格森思想中的一個核心張力：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與政治行動的偶然性之間的矛盾。羅馬從野蠻(savage)發展至共和政體，體現了社會進步的必然歷程；然而，共和制度的腐化與帝制的興起，卻被歸因於個體的道德選擇與行動失誤。⁹⁸這種雙重解釋模式正反映出十八世紀史學的根本困境：如何在承認歷史發展規律的同時，仍為道德責任與政治改革保留空間？佛格森的解答是，將不同層面的因果框架分別應用於不同的歷史階段——以結構性分析闡釋制度的形成與興起，以道德性判斷說明制度的衰退與崩解。

雖然佛格森在《文明社會史論》中對意外後果概念進行了深入探討，並以此理論解釋羅馬制度的生成與社會演化，但在《興衰史》中，這一論點卻明顯被邊緣化。這種理論重心的轉移揭示了佛格森思想演變的一個關鍵面向，也是既有研究較少注意的問題。儘管如此，他在《興衰史》中仍偶爾運用「意外後果」的分析框架。例如，在評價蘇

⁹⁷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3.

⁹⁸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84–185.

拉土地沒收政策時指出：

不論蘇拉施行這項專斷權力措施的本意為何；縱然此舉對受害者而言極為殘酷，而其中是否真有無辜者尚難斷定；這項措施在短期內確具有終結公共混亂的直接效果。然而，這項措施所帶來的後果更為深遠：它為新興的軍隊及其野心勃勃的將領開啟了一條途徑，使他們在奪取同胞財產的同時，也能長期掌握國政，不再像蘇拉那樣只是短暫地主宰政局。而這樣的發展，在當時恐怕尚無人能預見。⁹⁹

然而，這類分析是《興衰史》中的例外，已不再具有《文明社會史論》中，那種關於政治與社會制度的非意圖性起源的理論深度。佛格森的重心，從探討歷史發展的內在機制，逐漸轉向追究個體行動者的道德責任——這種轉變反映出他在政治危機的詮釋上，傾向以德性化的方式理解歷史。遵循人文主義敘事史的傳統，佛格森在《興衰史》中以歷史人物的性格與抉擇為敘述核心。格拉古兄弟、馬略與蘇拉、小加圖與西塞羅、龐培與凱撒等人，不再只是歷史結構的載體，而成為歷史轉折的主導者。

這種「道德歸因」的解釋模式，揭示了佛格森思想的一項根本侷限：他雖深刻洞察共和制度的內在矛盾，卻未能提出超越道德勸誡層面的制度性解方。儘管在論及羅慕路斯與努馬(Numa Pompilius, c.753–672 BCE)等立法者時，他仍提醒「不要輕易假定他們能夠完美預見後果」，¹⁰⁰但在整部作品的敘事邏輯中，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卻是個體的激情與野心。他在羅馬元老院的決策中，看見「統一而連貫的規劃」，甚至是

⁹⁹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33.

¹⁰⁰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4.

「縝密設計的政治佈局」。¹⁰¹由此可見，佛格森在評價政治行動者時始終維持一種張力：理性被視為政治規劃的必要條件，但若失去德性節制，理性反而會成為腐敗與專斷的根源。

佛格森在《興衰史》中的歷史視角，顯著不同於《文明社會史論》的理論取向。早期他將社會衝突視為政治演進的必要條件；到了後期，則轉而關注制度如何在內部矛盾與權力競爭的消耗下逐步崩解。這一觀點的轉變，不僅反映了他政治立場的調整，也揭示了十八世紀史學在面對現實政治時所遭遇的方法論困境。佛格森不再僅著眼於歷史發展的階段劃分(stadial history)，而是更關注政治事件的敘事與具體脈絡，強調制度如何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被塑造、動搖，並最終走向瓦解。本研究正是以此史學轉向為出發點，重新思考佛格森如何在新馬基維利主義與文雅論述兩種政治語言之間，發展出兼具道德判斷與制度分析的政治史敘事策略。

這種敘事方式使《興衰史》更接近古典歷史學傳統，而非休謨與羅伯遜的哲學史書寫。佛格森不再著重分析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或探討社會衝突背後的結構性條件，而是透過道德與個人責任的框架，檢視政治行動者的抉擇及其後果。這種將政治危機歸因於個人德性的解釋模式，揭示了他思想上的理論侷限。佛格森在評價提比略·格拉古時明言，「應當為其後果負責的不是人民，而是護民官」，¹⁰²而他對米羅(Titus Annius Milo, 95–48 BCE)刺殺克洛狄烏斯(Publius Clodius Pulcher, 93–52

¹⁰¹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71. 關於「個體野心與激情」作為羅馬政治發展的重要推手之深入論述，亦見於 Adam Ferguson,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Being Chiefly a Retrospect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College of Edinburgh*, vol. 1 (London: A. Strahan and T. Cadell, 1792), 257, 顯示此觀點在佛格森後期著作中更臻成熟。

¹⁰²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87.

BCE)所引發政治動盪的評論，也同樣體現出他傾向以道德判斷取代制度分析的歷史詮釋方式。¹⁰³更關鍵的是，雖然佛格森在理論上批判歷史必然論，但他筆下羅馬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敘事，仍流露出一種潛藏的歷史決定論色彩。

這種以德性為中心的詮釋不僅形塑了佛格森的歷史敘事，也深刻影響了他對共和崩潰的整體理解。佛格森進一步將羅馬的衰亡歸咎於龐培與凱撒的野心，藉此為當代政治提供教訓，認為共和制度的存續取決於公民美德與制度平衡。然而，這種以道德為核心的解釋框架雖具有啟蒙式的警誡意涵，卻掩蓋了羅馬帝國擴張所帶來的結構性壓力，以及制度在面對新挑戰時的適應問題。佛格森的分析最終凸顯了十八世紀史學的根本困境：當面對政治危機時，啟蒙理性往往退縮至道德歸因，而非提出制度性的解決方案。

本研究的核心貢獻在於重新定位佛格森在十八世紀史學傳統中的地位，並揭示他獨具特色的歷史敘事策略。透過將《興衰史》置於羅馬史書寫的整體脈絡之中加以考察，而非僅視為政治哲學的附屬文本，本文指出佛格森如何在新馬基維利主義對政治衝突的重視，與文雅論述對社會和諧的追求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的歷史書寫。這種敘事策略反映了他在史學方法上的關鍵轉向：不再以線性進步的視角解釋共和的瓦解，而是將羅馬的衰亡理解為制度在內部矛盾與外部壓力下逐漸失衡的歷史過程，從而使他有別於其他承襲英國共和主義傳統的歷史學家。佛格森深刻洞察共和政治的內在張力，認為政治活力必然伴隨衝突，而過度的衝突則足以摧毀制度本身。然而，他始終未能擺脫將政治失序歸因於個人道德缺陷的詮釋框架。這種道德主義的傾向，使他忽略了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制約力量，也限制了其理論的普遍

¹⁰³ Ferguson,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225.

適用性。更為弔詭的是，儘管佛格森一再強調個體抉擇與道德責任的重要性，他對羅馬衰亡的描寫卻隱含著一種歷史循環與宿命論的陰影。

這些理論上的張力，使《興衰史》在啟蒙時代的史學發展中佔據獨特地位，呈現出當時史學家在理性分析與道德判斷之間的掙扎。佛格森對共和政治悖論的敏銳洞察，不僅為理解啟蒙史學提供了新的視角，也揭示了十八世紀思想家如何在面對現代性挑戰時重新思考政治與德性的關係。今日，在民主制度同樣面臨極化與信任危機的情勢下，佛格森對政治衝突與制度穩定之間微妙平衡的思考，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本文藉由對其史學轉向的探討，嘗試為重新理解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政治史學傳統開闢新詮釋路徑。

(本文於 2025 年 3 月 3 日收稿；2025 年 10 月 15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亞當·佛格森的斯巴達論述及其思想淵源」(計畫編號：112-2410-H-003-118-MY2)之部分研究成果，研究執行期間蒙國科會經費支持，謹此致謝。在論文構思與撰寫期間，承蒙陳正國教授於相關議題上分享見解與交流意見，獲益良多，謹致誠摯謝意。同時感謝《新史學》諸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精闢評議與寶貴建議，對本文的修訂與完善深具啟發。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 Echard, Laurence. *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Building of the City to the Perfect Settlement of the Empire by Augustus Caesar: Containing the Space of 727 Years*. London, 1696.
- Ferguson, Ad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edited by Fania Oz-Salzber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Ferguson, Adam.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Being Chiefly a Retrospect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College of Edinburgh*. 2 vols. London: A. Strahan and T. Cadell, 1792.
- Ferguson, Adam. *Remark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Price: Intituled,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London, 1776.
- Ferguson, Adam.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Ferguson*, edited by Vincenzo Merolle. 2 vols. Brookfield, VT: William Pickering, 1995.
- Ferguson, Adam.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Complete in One Volume*. London: Jones & Company, 1834.
- Gibbon, Edwar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ited by J.B. Bury,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E.H. Lecky. 6 vols. London: Lackington, Allen & Co., 1820.
- Goldsmith, Oliver. *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2 vols. London: S. Baker and G. Leigh; T. Davies; and L. Davis, 1769.
- Hume, David.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Foreword by William B. Todd. 6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3.

二、近人論著

- 陳建元，〈伯納德·曼德維爾論十八世紀文雅文化與國家富強〉，《新史學》，34：2(臺北，2023)，頁1-49。

- Allan, David. *Adam Ferguson*. Aberdeen: AHRC Centre for Irish and Scottish Studie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2006.
- Hamowy, Ronald. "Scottish Thought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dam Ferguson's Response to Richard Price." In *Liberty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David Womersley, 348–387.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7.
- Hamowy, Ronal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the Theory of Spontaneous Order*.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Hill, Lisa. *The Passionate Society: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Mor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 Hont, Istvan.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cDaniel, Iain. *Adam Ferguson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Roman Past and Europe's Fu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Meyer, Annette. "Ferguson's 'Appropriate Stile' in Combining History and Science: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Revisited." In *Adam Ferguson: History, Progress and Human Nature*, edited by Eugene Heath and Vincenzo Merolle, 131–4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
- Pocock, J. G. A.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2, *Narratives of Civil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ocock, J. G. 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Pocock, J. G. A.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her, Richard B. *Church and Universit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Moderate Literati of Edinburg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kjönsberg, Max. "Adam Ferguson on Partisanship, Party Conflict,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6:1 (2019): 1–28.
- Smith, Craig. *Adam Ferguson and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Moral Science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9.
- Winch, Donald. *Riches and Pover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ritain, 1750–18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三、網路資源

Nederman, Cary. "Civic Humanism."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dward N. Zalta and Uri Nodelman. Spring 2024 Edition.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4/entries/humanism-civic/>. Accessed November 23, 2025.

Between Conflict and Order: Adam Ferguson and the Moral Uses of Roman History

Chien-yuen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reconsiders Adam Ferguson's *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783) within the broader landscape of eighteenth-century Roman historiography, especially in its dialogue with Edward Gibbon's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1788). Ferguson's narrative reveals a tension between the neo-Machiavellian language of civic conflict and virtue and polite culture's ideal of order and harmony. From this tension, he developed a form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at sought to reconcile moral reflection with political analysis. Through his treatment of sources, character, and institutions, Ferguson explained the logic of Rome's republican decline while addressing the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republicanism and empire. The article repositions Ferguson withi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and highlights his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moral uses of history.

Keywords: Roman Republic, Edward Gibbo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Adam Ferguson